

习近平外交思想历史逻辑的三个向度

孔庆茵 罗一鸣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其发展完善的历史逻辑值得深入研究与总结。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向度上,习近平外交思想汲取中华文化智慧与文明成果,鲜明展现推动全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向度上,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新时代由社会主义大国向社会主义强国迈进的外交征程中,既为扎实办好中国的事情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朝着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向迈进。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向度上,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彰显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拓性意义与推动全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世界性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2)03-0005-08

10.19742/j.cnki.50-1164/C.220301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其发展完善的历史逻辑值得深入研究与总结。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向度上,习近平外交思想根植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精华,总结发扬因应当今世界变局的中国智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向度上,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立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国际局势演变规律的科学研判,坚持在党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安排,在新变局下走出一条在理念上富有中国特色、在行动上展现中国风格、在实践中彰显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习近平外交思想博采既往传统外交理论之长又加以创新发展,坚持问题导向,紧扣世界发展大势,多措并举夯实多边主义基石,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与突破。立足当下时代挑战,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发挥中国作用,展现中国担当,完善外交工作总体布局,与世界各国积极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在时代前进的征程上引领中国前进,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引领世界前行,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中华民族发展史向度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历史逻辑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向度上,习近平外交思想生成的历史方位使中华民族相较之前任何一个历史时

收稿日期:2021-09-18

作者简介:孔庆茵(1974—),女,四川内江人,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后,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秩序、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罗一鸣(2000—),男,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秩序模式研究”(20XGJ001)。

期都更具信心与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高扬进取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更加奋发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155}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解世界二重性的问题积累相当丰富的政治智慧与科学经验,生动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的强大文化内生力,完整诠释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品格与民族胸怀,将历久弥新的中华思想体系与价值体系以中国话语的独特语言形式进行系统化学理阐述,深刻彰显出鲜明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

(一) 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外交气魄

《庄子·秋水》有言:“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2]563} 深受礼乐传统影响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历经磨难而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正是善于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将诸多民族的思想智慧融会贯通,形成了别具神韵的中华文化。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本理念推进外交工作。面对复杂严峻的全球治理困境,始终倡导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打造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格局。旗帜鲜明地反对少数西方国家独享全球治理权力,主宰全球治理事务,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诉求仗义执言,与国际社会广大成员一道共同协商建设符合客观实际与发展需要的全球治理制度安排。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的义利关系时,更多强调新时代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促进公平、伸张公义、维护公理,秉持义利共生,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运用自身发展的巨大优势与机遇带动其他国家一起发展,增进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与个别国家在利益面前一味追求“本国优先”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 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外交取向

协和万邦的“基本精神是创造一个合作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的世界”^{[3]74},其基本保障是维系和平。如果参与国际政治生活的每一个行为体都试图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冲突。协和万邦正是希冀在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甚至彼此龃龉的行为体之间增进互信,加强团结。作为协和万邦的历史尝试,古代中国通过自周天子以来逐步设计完善的“天下无外”的体系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创造的文明成果向周边大地辐射。天下大同则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为之薪火相承、接续奋斗的理想追求。其最终是为了建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4]71}的理想社会,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5]16}。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风险频仍的现实背景下顺应国际社会广泛期待与普遍向往的科学举措。在全球化持续发展的今天,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面对共同的严峻挑战,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隔岸观火。唯有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协同合作才是国际社会携手战胜疫情,共建美好世界的有力武器。

(三) 昂扬进取、自强不息的外交作为

中国古代志士仁人强调自身之于国家民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提倡奋发有为、知行合一的进取姿态。《论语·泰伯》中提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6]104},要求士人胸怀大道,以身弘道。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既坚持“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之道,为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维护国家利益、营造稳定环境、抢抓外部机遇、满足内生需要,又坚持“贡献世界,兼济天下”之道,注重顶层设计,始终统筹推进好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两件大事,旗帜鲜明地为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这一最大公约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倡导践行新型国际关系。在实现本国发展战略目标,强化正向利益预期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全球公共治理的多边主义价值导向,回应新形势下以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单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为突出标志的逆全球化思潮,凝聚全球最广泛利益,摆脱国家个别行动困境,在谋得自利的同时兼惠他利,进而扩大共利,以大国责任为前提,以制度设计为依托,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提供更多有益支持。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向度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历史逻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结构性互动始终有着敏锐洞察。一方面,对中国古代外交智慧进行了深入的辩证总结。中国古代外交理念是中国传统价值旨趣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问题上的集中反映。在外交取向上力求和睦,坚持“天下一家”的整体性思维。体现为在国际交往中秉承“兼相爱”的基本态度,以共存共生为价值原则,认为在挑战与纷争面前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反对发动一切非正义战争,强调在平等互敬基础上维系拓展与其他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在外交实践上力求和平,突出表现为中国先哲“以和为贵”的崇高理念。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主动捍卫和平,以德服人、以礼化人,没有扩张主义野心,没有好战称霸传统,坚持发展以包容互惠为基本特征的国与国关系,生动诠释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天下情怀与国际担当。在外交目标上力求和谐,明确“和而不同”的外交态度。“和谐”作为中国古代哲学重要的元概念,是矛盾的一种特殊表征,即矛盾双方的状态平衡、相互促进、彼此协调。反映在外交思想上,则基于各国国情千差万别,外交政策目标各不相同的具体实际,坚持最大限度统筹化解各方矛盾分歧,协调兼顾各方利益诉求。以对多样性、差异性的尊重为基础,凝聚共识,形成谅解,以期聚同化异。

另一方面,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近代外交理念进行了深刻剖析反思。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控制与压迫程度日益加深且彼此时有勾结的半殖民地特征导致近代中国外交的妥协理念与外部依赖理念的形成发展。妥协理念集中表现为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与政治恫吓之下,“委曲周旋”,以国家权益为妥协谋求暂时和平。外部依赖理念集中体现在当西方列强对华推行霸权主义,开展殖民扩张时,寄幻想于国际公理的制约或其他列强的所谓“调停”与斡旋,对世界大势认识不足。封建专制统治与传统小农经济仍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半封建特征导致近代中国外交的被动因应理念与“以夷制夷”理念的形成发展。被动因应理念受传统“夷夏大防”观念影响,仅以自我保全为追求,对参与国际事务缺乏兴趣,被动回应西方列强的对华外交政策。“以夷制夷”理念则在中外实力差距悬殊且国内各政治力量相互倾轧的特殊背景下,利用列强间的冲突对立,依靠其彼此牵制维持和平局面,囿于对列强间相互关系及其侵略本质缺乏科学判断,其作用也较为有限。同时,近代仁人志士也从未放弃争取国权,自立自强的斗争。反映在外交理念上,既主张竭力争取外部和平环境为变法图强提供机遇,把握斗争与议和的外交策略,又强调在坚定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积极谋求独立平等的外交地位。以此两方面思考为基础,从中国国家利益需求与国际形势复杂深刻演变的客观实际出发,先后形成了系列原创性的外交理论,指导新中国开拓性的外交实践,解决了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均面临许多复杂挑战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实施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而出现的诸多困难,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外交新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经七十多年筚路蓝缕的艰苦奋斗与栉风沐雨的开拓奋进,已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施社会主义改革,并成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立足新时代这一重要历史关头,习近平外交思想擘画崭新外交蓝图,引领中国外交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外交事业的各领域各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有更大信心、更强能力为全人类应对变局、维护和平,反对霸权、力促共赢做出贡献。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回应全球挑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与中国倡议,前所未有地,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出了强大的感召力、影响力、生命力,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与高度赞誉。

(一) 新纪元:开创中国独立自主外交全新范式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与旧中国的

屈辱外交决裂,在创造性的实践探索中丰富了外交经验,形成了富有鲜明特征的新中国外交理论。其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工作基本立场。施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以消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在打破西方外交封锁和外交孤立的同时逐步与多个邻国解决了边界勘定等历史遗留问题,与苏联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后又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在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同时,也与社会主义国家间开展外交活动中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毅然顶住外部经济与军事压力,始终将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尊严放在首位。其二,力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准发展国家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开创性成果,既强调权责一致,增进国家间理解互信,又强调平等尊重,有力鼓舞反霸反殖斗争,是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国家发展和平往来与友好交流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亚非会议上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广大亚非国家的高度认同,极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打消了许多国家的外交疑虑。其三,基于对二战后国际局势的深刻演变进行的细致分析,强调既与资本主义国家拓展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中法、中英建交等重大外交突破,更大力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采取灵活务实、积极主动的外交态度,形成了新的建交高潮。并伴随国力提升,相继取得了一系列诸如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许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外交胜利,收获了大多数国家的外交认同,使新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外交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二)新篇章:深化发展中国全方位外交全新格局

从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前,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顺应两极格局新变化与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演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外交工作新篇章。邓小平同志基于对“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7]105}的科学研判,一方面强调超越意识形态界限,努力消弭历史障碍,结束历史曲折,积极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外交合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推动中美建交与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把握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进程,以国家战略利益作为根本考量,强调外交应为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服务,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新旧交替之际,主张韬光养晦,力争有所作为,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初步形成,以伙伴关系为依托的全球外交布局持续深化。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抢抓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外交任务,深化了对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科学判断,积极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先后实现了中国入世、北京申奥与上海申博成功及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同时强调外交工作应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沉着稳妥地应对了台海危机、炸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等重大严峻挑战。胡锦涛同志提出倡导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立足于协调解决各国各地区间各领域依存度日益增长同单边主义思潮和现实发展鸿沟日益凸显的客观矛盾,为谋划系统性、稳定性、均衡性的世界发展提出中国构想。强调积极落实好国际事务中的对话协商与综合治理,以期推动各国和谐共生,实现和谐发展。在和谐世界理念指引下,我国外交工作迈上新台阶,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均成果丰硕,国际和地区事务参与度普遍提升,在深度促进多边主义合作,科学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与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生动彰显中国作为一个建设性参与方、推动方的大国诚意,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总的说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外交理念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捍卫国家尊严与安全的基础上,立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更强调助力国家经济建设与对外开放,推进我国综合国力不断跃升和营造良好有利、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两大任务。同时坚持与国际社会一道,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担挑战,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进一步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打破‘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8],有力地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与世界影响力。

(三)新时代:谱写中国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全新伟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

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世界大变局中凝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躬身体力行,发挥元首外交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遍及五大洲的数十次外访,在与外方政要、各界民众的亲切友好交流中共叙友谊,在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多边外交舞台上阐明主张。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根本战略目标,与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梦关乎世界命运,世界各国实现本国发展的征程上也能够与中国合作共赢,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进步相互促进”^[9]。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重要历史交汇期科学判断世界多维矛盾,将中国发展全方位融入世界格局演进,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迁。

一方面,在把握外部环境基本特征的前提下统筹推进外交安排。习近平总书记运用主场外交优势生动宣介中国外交理念,先后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多场重要外交活动,凝聚多边政治共识,汇集协同商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力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相继举行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世界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合作文件,多项标志性成果落地见效。深度推进多条国际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完善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力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畅通多边投融资渠道,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满足实际需要、化解实际矛盾的公共产品与发展红利。同时注重培育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富有全新机遇的多个重要领域,完善总体外交布局。畅通民间外交渠道,积极发挥友城、媒体、智库、人民团体等多个主体的不同资源禀赋优势,结合政府外交的有力支持,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轨并进,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在友好互鉴中不断夯实中外务实合作的民意基础,积极增进中外民众相知相亲的友好情谊。加强文化外交作用,深入发挥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文化交流机构的纽带效能,多措并举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模式这一“供给侧”改革,宣介传统文化精华,推广当代中国进取风貌,将丰富的文化资源与生动的文化创意转化为外交“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勇于争取与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国际文化话语权。完善政党外交效能,既不断充实中国政党外交的深厚底蕴,将加快构建新型政党关系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深化政党外交格局为抓手加强与各国政党的沟通协作,向世界彰显中国共产党的独特魅力与进取精神;又不断扩展中国政党外交的实践外延,超越各类差异,拉近彼此距离,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原则,共商人类前途命运,汇聚支持信义、集聚合作信心、积聚战略信任。

另一方面,在世界形势变局中笃定中国外交的崇高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筑牢战略自信,维护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秉持公义,支持反帝反霸斗争,根据对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判断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地决定立场与政策。在世界过渡转型期背景下感知时代大势,维护和延长我国战略机遇期,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底线思维,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妥善维护好海外安全,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南海等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表明原则立场,主动在国际社会占领舆论高地,澄清事实真相,积极抵御西方势力的政治操弄与政治干预图谋,就其挑衅破坏活动敢于并善于进行斗争与遏制。强化风险意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认清风险、规避风险,“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10],将中国的发展进步、和平繁荣与世界的发展进步、和平繁荣有机协调,在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的同时丰富完善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框架,谋划好中国与世界美美与共、合作共赢这一大格局,在新的更高起点上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三、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向度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历史逻辑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向度上,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与人类社会变革激荡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了着力破解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开展外交、如何因应变局、如何搞开放、如何促发展的时代命题。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与核心立场,又富有鲜活的现实气息与当代价值,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凭借其特有的理论飞跃与理论革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全新境界,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新贡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向度上,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不仅“是新时期我国外交事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1],对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也具有重大价值与深远意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在加快本国各领域发展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立的迫切愿望拓展了外交路径选择,以中国的成功探索为外国提供富于借鉴意义的经验启示;也为人类携手应对复杂挑战与多元危机,共同破解全球化问题与时代瓶颈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破除了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痼疾,阐明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科学系统的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在新时代开拓性的外交实践中日臻充实完善。

(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提供科学国际观与外交方法论指导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立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纪元”的社会现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

1. 对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化间的交往逻辑展开深入思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就文明交往的影响因素上,马克思主义提出文明交往同经济政治交往有直接的内在关联。近代以来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国际分工的逐步完善,推动跨越国界的文明交往日益密切;就文明交往的动力来源上,马克思主义又强调文明交往形式与现实生产力水平的矛盾运动作为核心动力,推动交往的范围呈波浪式扩大,水平呈螺旋式上升,在打破封闭孤立状态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完整的世界历史,赋予个体的存在以世界性意义,强调应积极在与时俱进的社会化文明交往实践中培养国家或民族的开放眼光与学习品格。就文明交往的历史意义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既是推动人类整体进步与变革的重要条件,也是不同国家或民族保持精神活力的重要手段,这充分表明了文明传播与交流的历史价值。

2. 对近代资本主义列强主导下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逻辑进行了辩证建构,对近代外交博弈与冲突的内生本质作出了科学判断。资本逐利的扩张性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生产流通链条中的有利地位,建立起一套优先满足资产阶级利益的世界经济秩序;又借由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地区乃至全球霸权或进行垄断性殖民掠夺,或通过战争等手段,建立起一套优先满足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世界政治秩序,逐步完成了以资本的世界市场主导与生产要素控制为突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发生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的二重根源:一方面,由资本利益碰撞产生的霸权思维、强权政治引发资本主义列强间冲突;另一方面,由资本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导致的殖民主义侵略引发资本主义国家与尚未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国家与地区间冲突。

3. 始终坚持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获得最终解放为基本外交伦理旨归,表达了反对列强霸权式外交的鲜明立场。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12]287},阐明各资本主义列强以侵略战争为重要手段的强权政治思维,是国际社会爆发冲突与碰撞的核心原因,强调以道德、正义与平等作为普遍的国际关系伦理属性代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外交伦理观中的残酷、非正义、压迫属性,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同时明确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历史价值与历史地位。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13]399}的时代背景下,无产阶级可以成为也应当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马克思主义主张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斗争的矛盾运动中发挥无产阶级的国际作用,摆脱资产阶级强加的精神桎梏与物质制约,其开创的理论原则与分析方法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思想成果。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历程:既因应百年未有外交变局又书写天下为公外交轨迹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历经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升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外交思想应运而生。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大创新,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超越。

习近平外交思想就其创新而言,(1)“新”在中国思考。在对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关切中强调全球化的必要性,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应在更高水平上坚持并完善全球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的有序性,奉行多边主义观念,推动维护二战后构建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强调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反对所谓“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各国均有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强调全球性挑战的可控性,倡导共克时艰、综合施策、合作应对;强调把握好世界主流,恪守和平原则,推动发展共赢。(2)“新”在中国理念。习近平外交思想顺应时代呼唤,回应共同诉求,解决严峻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世界增加更多确定性、稳定性的中国思考。(3)“新”在中国责任。中国在国内发展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庞杂,国家发展战略处于重要历史节点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更加强调自身之于国际社会的积极贡献与主动作为,不仅为世界营造更加普惠、平衡、包容的发展机遇,而且为世界提供更富有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国际公共产品,“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14],从宏大理论构想演化为丰硕的行动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共鸣。

就其超越而言,(1)体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进程建构对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的新超越。习近平外交思想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可以在求同存异、彼此尊重基础上实现共赢,增进交流、推动合作的过程正是国际关系各主体产生相向互动,进而建构互信,纾解矛盾的过程。相较于西方所谓“普世性”集体观念,习近平外交思想更加具有互谅性与包容性,更能兼顾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关切。(2)体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新型国际关系论对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稳定与均势论的新超越。西方理论话语下将霸权稳定与维系作为国际关系秩序属性的根本因素,究其实质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不平等地享有霸权地位的现状的学理辩护。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鲜明指出“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5]540},在学理高度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国际关系中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动辄排外、“脱钩”的所谓麦卡锡主义,强调在平等与民主基础上秉承多边主义治理取向。既倡导推进“南南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又倡导“南北合作”,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展广泛合作,以期在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景下利用好各领域多边机制化平台,推动全球化健康有序前行。(3)体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西方权力转移理论的超越。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从未停止以自身观念逻辑阐释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发展密码”的理论努力,提出了“现行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利益攸关方”等理论命题,企图消解中国成就的话语正义,抹杀中国道路的理论正义,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凭借其在国际话语舞台和国际舆论格局中的主导优势构造话术陷阱与传播障碍,千方百计试图挤压中国所应有的话语地位与表达空间。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目标,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全人类共同困境,解答全人类共同关切,坚持并行不悖、彼此成就、共谋发展的大国风范,强调“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15]545},“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美国”^[16],为有效完善全球治理秩序,推进消除既往积弊的新型全球化建设,作出了富于创见的中国贡献,赢得了世界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与认同。总之,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与大国作为,清晰确证了对西方国际关系话语模式与理论体系的历史超越,生动彰显了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宽广视野与伟大构想。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2]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3] 赵汀阳. 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 [4] 康有为. 大同书[M]. 北京: 古籍出版社, 1956.
- [5] 费孝通. 人的研究在中国[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 [6]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8] 裘援平. 中国特色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J]. 求是, 2012(20).
- [9] 阮宗泽. 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J]. 国际问题研究, 2020(1).
- [10] 习近平.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J]. 旗帜, 2019(2).
- [11] 杨洁篪. 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7-01-14.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4] 习近平.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 2017-01-18.
- [1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16] 王毅. 维护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N]. 环球时报, 2020-07-10.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s Historical Logic

Kong Qingyin Luo Yiming

(College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guides the vivid practice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cientifically.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s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ing and summarizing. In the dimension of Chinese nation's history,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acquires Chinese cultural wisdom and achievements of civilization and shows clearly the theoretical power to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history,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creates an enabl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affairs and promotes the whole world toward a fair and reasonabl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direction by Chinese development in the progress of the new era from a big socialist country to a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In the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s history and human society's history,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displays fully the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of Marxism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orldwide value of lofty peace and development cause for humanity.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istorical logic

[责任编辑: 左福生]